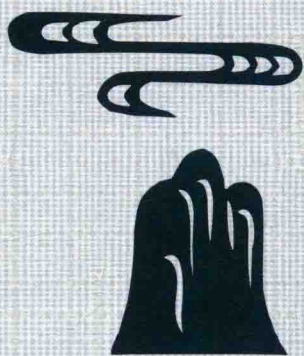


儒家的如何是好

朱承 著



儒家的如何是好

朱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的如何是好 / 朱承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495 - 9149 - 7

I. ①儒… II. ①朱… III. ①儒家—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1021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刘孝霞
装帧设计: 瞿 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工业区 邮政编码: 102600)

开本: 720mm × 1 000mm 1/16

印张: 13 字数: 171 千字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系列
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择优出版计划(2015)

目录

绪言： 儒学传统与时代精神	1
一、新文化运动与儒学命运的转折	2
二、历史上的儒学与时代精神	5
三、现时代的儒学复兴运动	7
四、儒学传统的多重维度	10
五、儒学传统与新文化运动传统的融合	13
第一章 古典生活与儒家之道	17
一、伦理道德与生活方式	18
二、传统生活方式与小农经济	20
三、儒家伦理与传统生活	23
第二章 理想的生活	31
一、理想的人格	31
二、生活的志向	41
三、理想的社会	44

第三章 愉悦的在世	49
一、成就自我的本然之乐	49
二、成全他人的一体之乐	53
三、自信宽容的内在之乐	59
第四章 在规矩中自在	66
一、“欲”与“矩”	67
二、“心矩”与“外矩”合一	73
三、“舍己从矩”的风险	77
第五章 纠结的选择	82
一、“仁义而已”与“何必曰利”	83
二、“彼一时,此一时也”	88
三、“舍生取义”与“死伤勇”	92
第六章 认知与行动	98
一、知行哲学的伦理色彩	99
二、道德认知与道德行动	101
三、知行哲学与修养之方	109
四、伦理实践与政治实践	112

第七章 知识与价值	115
一、知识与价值的张力	116
二、格物的知识倾向及其矛盾	119
三、格物的价值转向	128
第八章 政治的焦虑	138
一、儒家政治关怀的传统	139
二、政治对儒学的需要	141
三、儒者参与政治生活	144
四、奉行礼教与政治干预	148
第九章 生死的忧敬	154
一、肉身之忧	155
二、现世之忧	159
三、丧祭之忧	162
四、身后之忧	165
第十章 从地方到世界	169
一、地方性问题的世界解决	171

二、世界历史与世界性眼光	174
三、民族国家与天下观念	176
四、世界性视角下的现代中国与世界	181
结语	185
参考文献	191
后记	195

绪言： 儒学传统与时代精神

新文化运动直接质疑了儒学传统的时代价值，提出儒学已经难以作为支持现代社会生活的时代精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宣称：“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①我们知道，时代的发展离不开精神文化的潜在力量，每个时代自有其较具独特性的时代精神。从文化上来看，时代精神是一定时间内社会共同体的集体性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体现在大多数人的精神选择趋向上，往往以某一种思想学说主张作为其象征。牟宗三先生曾提出：“文化意识，在历史的曲折发展中，有时向上，有时向下，有时是正，有时是反是邪，这种曲折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精神’。此亦叫做‘时代精神’或‘时代风气’。”^②“历史精神，文化意识，乃一民族之生活承续所必然呈现者。”^③历史地来看，儒学正是牟宗三所指的这种“历史精神”或者“文化意识”，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必然呈现者”。儒学在中国历史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主流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识，引导着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但这一情况在 100 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儒学不复被人们视为时代的精神动力，反而被视为阻碍时代前进的绊脚石，传统儒家崇尚的很多曾经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变成了须要重新审视的对象。在现代性视野里，儒家以何种姿态自处为“好”，儒

① 陈独秀：《答佩剑青年》，《民国丛书》第一编《独秀文存》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47页。

② 牟宗三：《历史哲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6页。

③ 同上书，第9页。

家观念中哪些是“好的”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儒家观念又该如何成为“好的”，这些问题总是不断地出现。

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百年了，时代发生了巨变，在中国大陆，儒学又一次呈现复兴的趋势，而新文化运动也时过境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现代性精神与儒学的纠缠，如何看待儒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在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如何是好”式问题，随着儒学的再次复兴，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史命题。

一、新文化运动与儒学命运的转折

儒学作为主流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识，自西汉以来，虽间或有佛道的袭扰，但其在精神上的主导性地位几乎很少受到质疑。如所周知，晚清以降，儒学究竟还能不能担负起民族心理的职责，儒学还能不能作为精神与文化动力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序列，这个问题逐渐成为困扰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迷思，而新文化运动更是将“儒学是否适应现代生活”“儒家还有没有好的价值”之问题以极为尖锐的方式提出来，并对其做了近乎否定的回答。

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指出：“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①梁启超的这句话颇能代表新文化运动时期批评儒家的知识分子们的心态。陈旭麓先生曾总结道，新文化运动是“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总体性的理性批判。这场带有摧毁性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旧伦理及其人格化代

^①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表”^①。所谓“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现实”，就是当时袁世凯、张勋等人也都曾假借孔子来搞帝制的复辟，以及当时遗老遗少们的复古主义等。在这一社会现实乃至上溯至鸦片战争以来的国家衰弱现实的刺激下，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吴虞等吸取了现代性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将矛头指向了儒家的传统。陈独秀曾说：“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②可见，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并不是刻意要诋毁历史上的孔子，而是认为儒学已经很难回应现实问题，反而还被人利用以抵抗现代潮流，故而，必须反对之。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主张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判断和批判等因素，也有儒家传统确难回应现实的现代性问题等深层次的原因。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对儒学展开的猛烈抨击，为当时及后来思想文化领域内有目者所共睹，鲁迅更是以“吃人的礼教”一词对儒家文化贴了一个形象的标签，为人所熟知。如果说，科举考试和帝制的废除摧毁了儒家赖以生存的制度化条件，那么新文化运动则从思想上对儒学做了更为彻底的清除，从那时起，儒家传统声名狼藉，厄运不断。以“文革”为代表的运动式破坏，更是对儒学的命运带来了几近毁灭的危机。

新文化运动往往被人们称作是中国新的诸子百家时代，是新的思想解放、人文启蒙的时代。胡适曾经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来形容新文化运动^③，瞿秋白1925年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文，称新文化运动顶峰的五四运动之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化中国之

①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熊月之、周武编：《陈旭麓文集》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42页。

② 陈独秀：《孔教研究》，《民国丛书》第一编《独秀文存》卷一，第626页。

③ 胡适曾在五四运动39年后的1958年5月4日做过“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称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最好，该演讲见姜义华主编的《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化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285页。

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①，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划时代”。作为“划时代”事件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从政治革命层面来说是恰当的，更重要的是从文化和价值观念层面界定的。比如说，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学，就是对汉语书写的一次革命性改造，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本模式，是20世纪以来汉语文学创作及其他各种汉语书写的源头。虽然，新文化运动后来逐渐由文化运动转变成政治革命，但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心理层面上实施了对儒学的全面打击。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看来，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价值替代儒学传统成了新的时代精神。

如胡适等亲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人物所言，新文化运动对现代中国进程的影响至大至重，为现代中国从引进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文化运动的方式缔造了民主、科学、自由、进步的新统。这一传统首先体现在知识分子或者精英文化中，20世纪重要的学科、学术、思想、文化的革新和变化基本上都会溯源到新文化运动。同时，随着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逐渐壮大，并将新文化运动之顶峰的五四运动定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且还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发源事件之一，这样，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以传统为批判对象的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民主、自由、科学等价值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导致信奉这些现代性观念的人对儒学传统逐渐忽视。概括地讲，即使是部分知识分子对儒学传统还心存留恋，但理智上大多还是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价值。从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由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现代性精神启蒙历程似乎完成了对儒家传统的颠覆，儒学似乎已经彻底被时代抛弃，不能担负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但历史远非如此简单。

^① 瞿秋白：《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三），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5页。

二、历史上的儒学与时代精神

我们知道，儒学自创立开始，就与时代精神关联在一起，一代又一代的儒者关心并思考时代的问题，不断寻求美德与良好的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可能的问题。孔孟时代，诸侯纷争，天下大乱，诸子百家围绕“如何实现好的社会”展开了论辩，社会急需一种解决纷乱的思想意识形态来改变社会现实的乱局。孔孟栖栖惶惶周流天下，游说列国，心心念念的是在现实政治中如何实现“从周”“仁政”等政治理想，期望通过提出道德仁义的思路，主张社会应该由仁义而走向和平、安宁乃至繁荣。其实，在中国传统中，不只儒家思想如此，其他诸子思想也产生于对良好社会生活的追求之中，老庄著述立说无外乎在思考怎样回到“小国寡民”“清静无为”的社会；而墨家更是在身体力行地践履“兼爱”“非功”“尚同”的政治理想；其余所谓百家争鸣的问题之中，也总有对“治国之道”“礼法”“古今”等政治问题的理想认识贯穿于其中。^①孔孟所处的时代，呼唤一种能够解决乱局的思想观念和观念，寻找一种“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治理思路来处理时代问题，正是在这一历史情境下，孔孟的仁义思想天然地与当时之时代精神关联起来。

到了汉代，历经董仲舒和汉武帝等联合推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运动，提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②的国家意志战略，使得儒家思想成为政权依赖的主导性的时代精神，或者说成了国家“意识形态”。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于“意识形态”一词的解释，“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行为模式和方

^① 李泽厚先生就曾经指出：“大体来看，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方面经历过五个阶段。在先秦，主要是政治论的社会哲学，无论是儒、墨、道、法都主要是为了解答当时急剧变动中的社会基本问题，救治社会弊病。”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18页。

^②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8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

式,并否定其他的一些行为模式和方式”^①。从这个角度看,儒学自汉代开始,就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开始展现解释、评价、指导现实世界的精神力量,并且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具体的现实力量。虽则由于讖纬神学的滥觞,导致儒家精神走向歧途,但从社会崇尚和生活制度的角度而言,儒家依然牢靠地占据了汉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地位。

儒家在精神领域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从汉末到隋唐,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道教、佛教在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异军突起使得儒学在义理层面裹足不前,在整个时代精神的格局中承受了佛、道两家的巨大压力。而儒学在时代精神格局中的式微,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则是人们对佛教的狂热追随,韩愈在《论佛骨表》里,曾痛心地描述当时佛教的兴盛,所谓“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自暮,转相效仿,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②。可见当时佛教价值观念在生活中对普通人群的重大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佛教的狂热性情绪,意味着对儒家精神的冷漠与忽视。

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尴尬地位一直到北宋时期才得到根本改善。北宋以来,儒家学说的新形态——理学——的出现,使得儒家在道德形上学的层面获得了新生,从义理层面深刻地回答了“美德如何可能”的问题,儒学在思想上开始对佛、道进行了有效的反击,并在这一反击中逐渐夺回了精神领地。此后历经宋、元、明、清,儒家都一直坚定地守住了社会精神的阵地,儒家所主张的价值观念和礼仪制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原则,儒学重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时代精神。

但是,宋明儒学在义理上的精致发展并没有带来儒家社会的进步,正如有论者把儒家在宋明时期的胜利称之为“得不偿失的胜利”^③。宋明新儒

①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5页。

②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5页。

③ [美]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8页。

家在道德形上学上取得的理论性进步，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社会在思维上逐步陷入惯性和停滞。因此，宋明新儒家将道德理想主义、道德保守主义树为“国家正统”，逐渐导致政治上专制独裁、社会上约束个人自由的加重、改良和变革的步履维艰，这一点常常为人们诟病。当然，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需要充分的探究与论证。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儒学的批评，也正是针对了儒学及运用儒学来控制社会的政权对于人心与社会的束缚。故而，儒家在宋明时期的精神主导地位也不能改变儒家理想从未实现的局面。儒家理想从未实现的状况，在近代中国，更是每况愈下，新文化运动将儒家命运的衰落推至极点。科举废除、帝制消亡使得儒学丧失了其制度性保障，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批判又使得儒学的精神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岌岌可危。作为时代精神的儒家思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中国历史上，儒学长期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二者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儒家精神，二千年来，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正面或反面地，浸透到每一角落的实际生活中。”^①儒学长期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主导性精神价值的地位，也保证了历代王朝的社会秩序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然而，由于儒学自身的理论推进远远跟不上近代以来社会的急剧变迁，使得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中迅速衰落。

三、现时代的儒学复兴运动

历史地来看，儒学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时候，未必受到政权和社会的重视，但一旦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的时候，儒学就会在思想版图上力图找回属于它的核心位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运动的减少和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社会稳定，大陆儒学在政府的理性支持、知识群体的深度发

^① 徐复观：《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徐复观全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页。

掘以及民间的强烈关怀下,一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颓势乃至“文革”时期的厄运,又开始了“一阳来复”的新生命历程。进入 21 世纪,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潮流下,儒学复兴的势头一直没有衰减,并随着政治力量、民间生活、儒家知识分子等多种力量的推动而呈扩大化的趋势。

新文化运动曾经彻底否定了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这一点多为后来学者所指摘。随着我们对于传统之认识越来越趋于理性,对儒学的现代意义的认识也越来越有所改观。毋庸赘言,儒学在现时代依旧可以发挥作用,这一点,几乎可以获得普遍性的共识。但是问题在于,儒学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却很难取得共识。其争论的焦点一般在于,儒学发挥的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 儒学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列文森),还是中国人的“心灵鸡汤”,抑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 另外,如果儒学对现时代具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儒学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体现在生活领域,还是在学术文化领域,或是在政治领域? 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于儒学在于现时代的负面作用曾经做了多重批评。吊诡的是,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对于儒家的积极作用之认识,也呈现了分歧百出的态势。在新的时代,儒家究竟该“如何是好”,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多方面的主张。

当前,众多儒者扩大儒家影响、发掘儒家价值的文化努力,对儒学本身发展和中国社会发展都有一定意义。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虽然或大或小,或隐或显,但从没有断绝过。杜维明先生曾在从时间跨度的角度分析儒学传统时提出这样一个预设:“任何精神传统,如果不发展、不扩大,就会死亡。它绝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一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是这个动态的过程受到冲击以后,它可能变成潜流,有的时候在思想界被边缘化,但它总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甚至有的时候断绝了,但它的影响力在社会各个不同的层级是一定存在的。”^①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儒学精神在中国

^① 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彭国翔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8页。

历史上的发展确实符合上述预设,即使在儒学被边缘化、成为潜流的时代,儒学精神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从未停息。在现代中国思想界中,虽然儒学饱受现代性的质疑和西方思想的冲击,但儒家学者对儒学在各个层面的不懈发挥就是这样一种表现。

我们认为,当前对于儒学复兴所做的各种理论和现实努力,其目的是在扩大儒学精神的影响力,使得儒学精神绵延不绝。就中国大陆而言,新时期以来的儒学复兴首先是从儒家心性之学、道德哲学等角度开展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的深入研究,如学者们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入分析与整理等学术工作,在这些研究中,儒家心性之学、道德哲学得到了全新的诠释与发挥。但是随着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变迁,进入21世纪的前十几年来,当代中国儒学研究者已经不满足于仅从心性角度、伦理角度去探讨儒学的思想内涵和道德作用,而是希望从多层次、多角度来理解儒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并以此回应新文化运动中对儒学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所谓“毒害”之质疑。

更直接一点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大陆新儒家以儒学为旗帜提出了政治诉求,表现或为建立“儒教政权”,或为创设“儒家文化特区”,或为“儒士共同体的仁政”,或为“儒家宪政”^①,或从文化、政治的大根大本之角度来为儒学张目。随着经济发展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很多人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敬意的人,为了实现探索中国思想和中国制度的突破,更愿意将目光投向曾在中国几千年传统中切实发挥过中流砥柱作用的儒学及其制度体系,并从思考传统儒家政治哲学范式乃至具体的政治思想、政体改革等角度出发来从事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建构,希望以此来丰富和完善中国的政治改革。

这一现象的发生,除了儒学思想自身蕴含内容的博大精深之外,我们认为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被纳入考量体系,比如说,儒学是真正“中国”

^① 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文化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78—205页。